



刘超介绍,这片小型拱棚今年要改建成钢结构的大拱棚。

萌妹子变“小羊倌”

告别国企,广饶姑娘回乡种胡萝卜养羊羔

大年初六,很多年轻人从家乡出发踏上了回城路。今年29岁的刘超也起了个大早,但她却是驱车十几公里来到了县城城郊。千余亩胡萝卜地旁,就是她工作的地方。

就在两年前,她还在大城市的国企工作,是名标准的白领。但这个萌妹子最终没能抵住家乡新型农业发展大潮的诱惑,回乡变身农场主,种起了胡萝卜养起了小羊羔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万兵

学工商管理的她 回家干家庭农场

“这些小型拱棚局限性很大,用不了大型器械,今年我们打算建钢结构的大拱棚,一个占地9亩多,棚内高就有5米,大机械也能直接进去。”这些充满“乡土味”的话,要是从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壮硕的中年人嘴里说出来,你可能不会太惊讶。但当一脸白净,甚至身材看上去有些瘦弱的刘超说出这些时,听的人都难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在多数人印象里,刘超这样的“文弱女子”似乎更应该逛逛街、聊聊美食衣服。但事实上,今年已经是她回乡当农场主的第三个年头了。

刘超大学时在济南一所高校学习工商管理,毕业后在一家知名国企工作,一干就是三年多。直到2015年初,这份白领的工作开始让她觉得不满足。原来,她的老家东营市广饶县也算得上是农业大县,过去,农民从事的是典型的传统农业,种玉米、麦子等粮食作物。

但最近一些年来,农业合作社等新型产业不断涌现。刘超的父亲就在2013年正式注册合作社,批量生产胡萝卜,出口韩国日本。“以前是订单模式,只管种,种出来就不管了,连收货都是订单加工厂来收。”刘超注意到,这种模式利润空间有限,风险也不小。

在和父亲的交流中,刘超了解到“家庭农场”这种模式,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“我们商量发展一个种养结合的绿色生态循环模式。”她在深思熟虑后,最终放弃国企的工作,成为张守凤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

刘超不是个例。但是她认识的同学朋友中,就有不少年纪相仿的人在慢慢回归家乡。有的回到小县城创办自己的企业,有的则干脆像刘超一样,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田间地头,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阅历发展农业合作社、休闲旅游、林下养殖等新型产业。

新想法层出不穷 父女动不动吵一架

作为一个典型的年轻人,刘超满脑子都是新奇想法。可农民出身的父亲不一样,守着50亩胡萝卜田稳扎稳打,发展到上千亩的规模。于是这一老一小,在投身到农场发展事业中时,“雷区”自然不会少,为大大小小的发展策略大吵一架也成了常事儿。

对刘超个人而言,从白领转型成农场主,也着实栽了些跟头。去年她突发奇想,引进了不少新奇品种,如紫萝卜、水果萝卜。但是好好的种子从国外引进到了自家地里,受土壤、气候等影响,却没有理想的收成,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说起自己在农场中的主业——养羊,刘超也不敢以成功自居。在大片胡萝卜田的一侧,几个羊圈里有着总共100多只羊,有黑山羊、山羊、绵羊等。从刘超往食槽中放草料的熟练动作看,她也的确是个正宗的“小羊倌”。

说起来,这是种养结合的绿色生态循环模式中重要的一环。前年,刘超在农场建了沼气池,在种植之外开辟了养殖领域,建立起“畜—沼—菜”的循环模式。萝卜缨成了羊的口粮,羊的粪便不光是天然有机肥,进入沼气池后连沼渣、沼液也能变废为宝。

一切循环起来了,刘超却还在为自己的羊如何盈利发愁。她的黑山羊长得慢,一年下来不过长个三四十斤。现有情况下,她往往都是利用了父亲现有的人工、技术资源,“揩了不少油”。

“有机会我就想去跟她学学怎么养殖,争取能合作一下。”刘超说。


刘超喂起羊来有模有样。

老人处听经验 同龄人里碰火花

年轻人创业,栽跟头在所难免。对刘超来说,更难得的是在摸爬滚打中让心沉静下来,把各种新式经营理念带到田间地头。

比如,“互联网+”大潮下,刘超决定把小小的胡萝卜引入电商中,拓宽销售领域。目前她已经着手做好了平台。“等大拱棚建起来了,可以多种点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,放到平台上零售。”

刘超坦言,总体上来说,像她这样的年轻农场主还是少数。她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,多和长辈们交流。“他们经验更丰富。”

另外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,自己可以和同龄人交流经验,这也是老一辈人不太会考虑的问题。“有的人有技术优势,但从来不会考虑经营模式的问题,种出来的东西等到卖的时候才开始发愁。”刘超说,但每个年轻人的脑子里,似乎都有一种经营模式。

不久前,她认识了一个朋友。“山东农业大学毕业,学历很高,专门做养殖研究的。”刘超说,这个姑娘也从去年开始养殖起观赏展示类的鸡。这在老一辈的眼里,就是一个极其陌生的领域,但对自己而言,却充满了吸引力。

“有机会我就想去跟她学学怎么养殖,争取能合作一下。”刘超说。



新春走基层融媒特别报道 种地喜忧



生在鲁中南山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记者已在外漂泊十几年,求学时每次回老家,都会有老人说,“你真是长大了,我都不敢认了。”如今已近而立之年,这句话却轮到我跟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说了,小山村的变化太快了。

山村年轻人 没有种地的了

本报记者 宋立山

以前的良田沃土 如今种上白杨树

“一亩地补贴150多元,都没人愿意种小麦了。”大年初一闲谈之间,父亲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,追问之下得知,我们村六十多户人家中,只有两户申报了小麦补贴,我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种小麦白受累,挣不到几个钱。”父亲选择用一笔账来回答我的疑问。父亲说,由于我们村地处山区,赶上好年景一亩地也只能产七八百斤小麦,按照市场价格每斤1.1元计算,一亩地仅卖800多元。若是年景不好,只能产五六百斤,收入600元左右,但成本不低,每亩地需要150元的肥料钱,如果灌溉三次,费用约为200元,再加上耕地、购买种子和打麦子的费用,每亩地的成本高达500多元。

也就是说,如果年景不好,辛苦一场,每亩地也就能赚点补贴而已,这还没有计入人力成本。

不光是小麦,种植其他农作物的也少了很多,小时候很多一度“炙手可热”的临河、平坦、肥沃的良田如今都栽上了白杨树,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想象的,种粮每年都有收成,栽树却需要七八年的生长周期,而木材也卖不了几个钱。

“种地收入太低,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,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,撂荒的地只会越来越多。”我一个40多岁的堂哥在家务农,他算起了一笔人头账,全村200多口人,常年留在村里的40岁以下青壮年男性竟只有1人,还是学成归来、子承父业的乡村医生。

而82岁高龄的四爷爷竟成了村里种地最多的人之一,虽已步履蹒跚,却仍种着十几亩良田。

小河边上建鱼池 不种地也能挣钱

农民不种地,靠什么养家糊口?这似乎是个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,这些不种地的老乡就像一群探路者,有的朝着现代农民的方向摸索,有的则竭尽全力尝试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,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,曾经贴在他们身上的农耕标签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。

老家的村子四面环山,地势不平,在规模种植上先天不足,但是山美水美,搞养殖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40岁到60岁的村民中,有相当一部分人撂下锄头之后转型当起了养殖户,养鸭、养猪、养兔、养鱼的,村里都不少。村里有两口温泉,除了大旱年份,几乎没有停喷过,不论冬夏温度恒定,成为养鲟鱼的绝佳之地。这几年,顺着温泉流出的一条小河,陆续建起了不少鱼池。

对于种地和养殖的差别,一位养鲟鱼的远房叔叔深有体会。在山区种地就是下苦力,投入高产出少,一年到头攒不下万块块钱,养殖却要好得多。他一年能养五六万尾鲟鱼,行情最好的时候能卖到每斤16元左右,行情差也能卖到11元左右,即便每尾鱼挣一块钱,一年也能收入五六万元。“我们靠近优质水源,而且是自流水,不需要用电抽水,跟其他地方相比,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几万块钱,只要没有病灾导致的大面积死亡,行情还是不错的,起码远非种粮能比。”